

发生遗传学上的变异——这自然影响它原本的药效。莫要单纯讥笑中医中药那些神奇验方如今动辄不灵——人类已经微乎其微还有机会面对一株得地气精华的“千年人蔘”了。被另一清代名医陈念祖(修园,1753—1823)贬到一塌糊涂的《本草纲目》(“学者必于此等书焚去,方可与言医道”)认为人参“能治男女一切虚证”。然而有点经验的医生都心知肚明,那个临危受命能发挥“补气救脱”、“回阳救逆”之奇效的人参娃娃,一定得是“野山参”,而不是那些用农药、化肥催产出来的粗、松、甚至空心的虚肿胖子。

这种一命抵一命的时刻,人类最可深切体验自己傲慢的无知与自然的伟岸。

五

“天命弗僭,责若草木,兆民允殖”,这是《尚书》中美丽的心思与善良的嘱托:人在大地之上犹如一朵深色的野花,孤独着草木的孤独,叹息着草木的叹息,经历着四时休王、五行生克、永恒无常……风吹雨打,地裂山塌,人与花花草草经历类同的命运,生生世世。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在《玉台新咏》的时代,距离今天很远的那些人们,总是在描摹自己的生活貌相与情感形态的时候如此富有同情与怜惜地刻画出来这些植物,人生草木中,欢欢喜喜携手,不是孤孤零零形单影只。“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这是花是草同时更是人自己。古典诗学里这种手段被称作“比兴”,似乎只是个章回小说中“得胜头回”的影子似的。但写诗的时代与读诗的人们却都明白,这些青竹、菟丝、女萝、蕙兰……出现在诗里她们是人类的朋友乃至亲人,物伤其类,她们和我们悲苦着一样的悲苦,哀愁着一样的哀愁,她们不是我们的什么“投射对象”、“喻体象征”,她们只是自己,她们站在我们生命的旁边、参与到我们生活的当中,是可以“执子之手”的那一个:

青烟颺其间,青袍似青草。

回风动地起,秋草萎以绿。

因此,与子偕老。

旗袍的前世今生

◎ 颜湘君

女子的衣柜里是一定有一件旗袍的,哪怕平常不穿,也是一定会有的,旗袍里藏着女子年少时的向往,成年后的成熟与氤氲。袖口间密密繁复的十八镶,是女子婉转的情思,吉祥的图案是女子对幸福的追求。看穿旗袍的女子步履

轻盈地走过,总觉得是婉媚,那低眉浅笑间不经意的魅惑顷刻间盈满了心田。曾几何时,旗袍成为了中华女子的美丽符号?很多人认为起源于满族旗女的袍服,然后在世易时移中掺杂了情感、时尚乃至政治而演化成今天的模样。

晚清徐珂《清稗类钞》载：“八旗妇女衣皆连裳，不分上下，盖即古人男子有裳、妇人无裳之遗制。”^[1]旗女所穿的连属的袍服就是最初的旗袍。

1911年辛亥革命后，帝制被废，民国建立，社会上竞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社会大气候也给女子服饰带来了变革气息。民国时候穿着美丽的华服高喊着“出名要趁早”的才女张爱玲曾以无限的热情写下了《更衣记》，对旗袍这种中华女子不能割舍的美丽衣裳陈述了一些缘由始末，她说：“1921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1920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2]二十年代的一些报刊上也登载了有关旗袍的时尚史话。1920年《解放画报》第七期有记：“不料上海妇女，现在大制旗袍。”1920年1月18日上海《时报》载：“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行。”1920年第十五期《人言》刊载《中国衣冠中的满服成分》一文，说：“近日旗袍盛行，摩登女士争效满装。”诸多史料证实，二十年代初上海、北京开始兴旗袍，很快便蔓延南下，广州和香港迅即流行，“民国十六七年（1927、1928），国民革命北伐军底定长江两岸，一切去旧布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青年妇女纷纷改着袍或长衫，通称‘旗袍’，于是妇女袍

服之风，迅速遍及全国”^[3]。

民国十八年（1929）4月，民国政府公布了《民国服制条例》，女子礼服有两款，一款是蓝上衣和黑裙，另一款是长身旗袍，旗袍正式成为国服。1930年，旗袍开始被部分中学、大学采用为校服。从此，上至政要夫人、名门闺秀，下至女学生与家庭主妇，都把旗袍视为正装。引人瞩目的宋氏三姐妹即经常身着旗袍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乃至国际舞台上。旗袍成了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国服。

当旗袍进入人们视野，成为中国女性的常服之后，也经历了一系列改良。

1931年，旗袍兴起“花边运动”，四周都加上了花边。1932年，沪上名交际花薛锦园率先穿上花边旗袍，未几，新派女性竞相效仿。旗袍在1933年之前多采用低衩或无衩，1933年后大衩开始出现。是年中，电影明星顾梅君经常身穿大衩旗袍出入交际场合。1935年，流行“扫地旗袍”，长至脚面，当时名闻上海滩的姊妹花陈玉梅、陈绮霞以穿这种旗袍而著名。1937年，日本人的进攻惊扰了蓬勃发展的时装业，一般人家都要辗转在战争的尘烟里，舒服便捷才是最高准则。此时的旗袍裁剪已完全西式化，抱身合体。四十年代，旗袍的式样趋向简洁，缩短了长度，减低了领高，省去了繁琐的修饰，更加轻便适体。在夏季，旗袍取消了袖子，使女士们露出雪白的臂膀，显得更加妩媚。

民国期间对旗袍的改造从未停止过，尤其是在上海，旗袍的长短、开衩的高低、有袖与无袖、袖之长短等方面，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是跟随着西方服装变化的步伐。

旗袍的改良发轫于二十年代中期“华洋杂处”的上海，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摩登女郎、社交名媛、电影明星、戏曲名角们对旗袍情有独钟，她们在旗袍的式样上争奇斗妍，标新立异，领导着时装的潮流。上海《时报》1920年1月18日《暖袍》一文说：“近来上海女界旗袍盛

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中则有这样一段描写:“吴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来到上海,怀中紧抱着《太上感应篇》,坐进三十年代的车里,像一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僵尸……南京路上,到处是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最让吴老太爷大受刺激的,是一位身穿高开叉旗袍、连肌肤都能看得分明的时髦少妇。那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双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这情形,不禁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终于,吴老太爷大叫一声,昏死过去……”

旗袍式样的改革过程中,抛弃了中国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旧貌,吸取了西方的审美趣味,大胆地体现女性的曲线美。旗袍既不同于旧式旗女长袍的方正谨严保守,又不同于西方服饰对人体的过分夸张,用西式立体裁剪方法来收束腰身,突出胸臀,裸露腿部,但同时保留了盘扣、镶滚边饰和立领右衽等传统造型和装饰手法。旗袍线条流畅,在显扬和遮蔽之间彰显了中国女性婉约含蓄的古典美。旗袍是利用传统服饰融合中西美学标准的成功尝试。

旗袍搭配灵活,可与毛线衣、大氅等配套,各种季节均可穿着,利用率较高。旗袍适应性强,可素朴可贵气,不加任何修饰则素朴,加上绣文或缀上珠宝,又显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派。

1947年,英国未来女王伊丽莎白公主即将举行婚礼时,意外收到了上海鸿翔时装公司赠送的一件贺礼——洋溢喜庆气氛和古朴风韵的漂亮旗袍,而且穿着十分合体,公主特意写了感谢信,此事引起了极大轰动。同年,鸿翔公司精制的六款旗袍在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上又荣获了银奖,从此,旗袍走向了世界服装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革命热潮的高涨和服装政治意义的强化,旗袍代表的闲适的淑女形象在新社会氛围里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除宋庆龄、王光美等极少数人外,无人再敢穿,旗袍至“文革”前已基本绝迹。

改革开放后,在一些礼仪场合,旗袍又成

为重要的女性服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衣旗袍者多为饭店的服务员,那些往往红得滴血、衩高及臀且皱巴巴的旗袍,无力唤起大众对旗袍美好的集体记忆。

九十年代末,服饰民族风的兴起,让爱美的中国女性再次将视线投射到旗袍之上。2000年,随着电影《花样年华》的上映,旗袍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花样年华》以浓郁的怀旧情调,展示了旗袍的美好、女子的曼妙和风情。旗袍成为东方女性古典魅力的表象符号,在世界上掀起了旗袍风。

大约从那时起,中国人中西合璧式婚礼上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新娘在婚礼上换穿两套新婚礼服,西式洁白的婚纱和中式大红或粉红的旗袍。新娘用美丽的旗袍见证自己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2007年开始,在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上海地区一直努力将“旗袍工艺”逐级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全国两会召开时,浙江女代表委员们将集体秀旗袍亮相一事虽然最终被叫停,但是,还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据称,这场名为“华装风姿”旗袍秀的策划者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服装设计师吴海燕委员,还将分别在人大和政协牵头提出建议和提案:倡议中国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着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女装。

灿烂辉煌的中国服饰文化,有什么可以作为女子传统服饰的最佳代表呢?旗袍下那婀娜的身姿,温婉的情致,早已在人们眼中心上留下美丽的风景。

注释:

[1](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三册“服饰·旗女衣皆连裳”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86页。

[2]张爱玲:《更衣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3]王宇清:《历代妇女袍服考实》,台北中国旗袍研究会1975年版,第98—99页。